

## 青年也發聲：

「長時段及東亞歷史視野中的『五·四』  
百年紀念研討會」

## Millennials Also Speak Out:

Summary to the Seminar on One Hundred Years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and East-Asian History

呂欣<sup>\*</sup>

Hsin Lu<sup>\*\*</sup>

2019年正值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日本東京大學於5月11日至12日舉辦了「長時段及東亞歷史視野中的『五·四』：百年紀念研討會」（圖一）。會議召集人設定的會議主題為「長時段」和「東亞歷史視野」，共二十位學者提交了會議論文。所謂「長時段」源自法

---

\* 作者現為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史學大師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理論，<sup>1</sup>「長時段」對應歷史結構，「中時段」對應歷史局勢，「短時段」對應歷史事件。其中，「長時段」最有助我們認清具體歷史事件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我們回望百年內「五四」的影響史和效果史，需要「長時段」視角。而關注東亞視野下的「五四」，一方面則因為多位與會中國學者有留日訪日的經歷；另一方面則因為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視角始終是中國研究的重要借鑒，而且日本思想界在戰後也經歷了與「五四」相似的思想追求。同時，會議也將作為「精神」與「方法」的「五四」作為討論的核心議題。本次會議在日本召開，也注重了日本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場域作用。此外，本次會議的亮點是本著「五四」精神，尊重五四運動主體是青年的史實，邀請多位年輕的博士生參與了論文點評。



圖一：日本東京大學「長時段及東亞歷史視野中的『五·四』：百年紀念研討會」學者留影

<sup>1</sup> Fernand Braudel,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ue Durée,” in *On History*, trans. Sarah Matthew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5-54.

## 一、長時段視角下的「五四」

中國傳媒大學劉春勇宣講的〈從長時段視角重審「五·四」與晚明之關聯——兼談「文」之實踐與行動性〉，從長時段的視角重新審視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五四與晚明的關係。文中先回顧了1930年代以來學界先後提出的「『文學』晚明舶來說」、「新文學源流說」、「資本主義萌芽說」、「『晚清仲介』說」和文藝復興說，認為前四種研究路徑的共同思路是一種「解放史觀」，旨在以西方現代性為標準，發現晚明「合現代性」的因素，從而建立五四與晚明間的關聯。這種做法一方面容易將中國的民族傳統「對象化」，造成民族文化在當下文化建設中的缺失，一方面將西方的現代性標準視為唯一的參考框架，無視長時段背後人類文明的一般規律。有鑒於此，作者嘗試在強烈的當下關懷意識指引下，以循環史觀為基礎，以比較史學的方法，以觀察「復歸健康鮮活之文明源頭的衝動」為核心關鍵點，立足「長時段」視角的概念，力圖提出一種「平行—會合」式的新史學闡釋範式。在此視角下，提出中國也有「兩次文藝復興」，前一次是西元8-9世紀中晚唐韓愈（768-824）等人推動的以古文運動為核心，最終開啟宋明理學的時代，後一次則是西元17-18世紀晚明清初顧炎武（1613-1682）等人發起的「學術復興運動」以至民國以後五四肇始的新文化運動。經歷了上古時期「諸子實踐時代」健康積極的中華固有文明時期，中古中國面臨異教入侵等歷史境遇，造成頹廢消極的中古文明形態，最終在宋元明時期得以第一次文藝復興。中國第二次文藝復興運動則是「文」的實踐性和行動性再次全面開啟的時代，首先表現為晚明諸子將「文」的根本屬性定性為「血性生命的實踐和家國擔當的行動」，其次是中西方均在這一大時段中注意到了「身體」的「生養」和「存慾」問題，再次則是民族光復與民族革命的開展。具體到個別歷史人物自身的追求與努力，章太炎（1869-1936）、周作人（1885-1967）、魯迅（1881-1936）和胡適

(1891-1962) 等人殊途同歸，最終目的無不是順應中國第二次文藝復興大潮，為之努力貢獻。評議人林少陽肯定該文的長時段視角，也充分認同講者對「文」之實踐性的強調。另外，講者在方法論上依據梁啟超(1873-1929)、同時借鑒余英時思想史研究成果，涉及面之廣，引起了與會學者的討論。講者又視宋明亡國皆因「主靜」，批判朱子學者均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粉絲，視顏李學派為「主動」之代表的觀點，然此乃一家之言，仍有廣泛的討論空間。

早稻田大學熊遠報的〈揭竿而起的書生——五百年中的「五四」？〉試圖從15和16世紀以來全球化競爭和向產業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中，知識分子角色和定位的轉變，解釋「五四」爆發的深層歷史原因。五百年來的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書生)經歷了從帝政體制科舉教育制度下培養的牧羊犬或者奴才，轉變為專業技術人員的歷程。知識分子從此具有了現代公民的意識和責任感，開展「五四」運動是他們一種新的社會參與方式。

「五四」發生地北京，其政治氣氛、市民社會的形態和思潮，與地方的有著很大的不同。「五四」在隨後百年中的「在地化」，自然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香港城市大學陳學然〈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考察了「五四」在香港百年在地化歷程，梳理不同政治力量的大歷史敘述，揭示不同時期南來知識社群藉五四抒發出的種種感時憂國之情。「五四」早期在香港經歷了緩慢擴散甚至被壓抑的過程，作者將1919至1930年代視作「五四」在香港「運而不動」的初始階段。由於南來的不同勢力政治立場的差異，「五四」在1940至1970年代的香港處於「左右分裂」的狀態。1970年代以後，新生代在相對安穩而繁榮的殖民地生活，開始對於各種不合理社會現象提出質疑與求變的訴求，才推動了「五四」精神真正的「在地化」。而回歸前後的香港，官方一直藉助「五四」紀念活動，宣揚「愛港愛國」的思想，但隨著香港社會問題的不斷增加，本土主義的一些議題和思潮在香港發芽生根。作者認為香港百年歷史不同階段的不同歷史

境遇造就了香港「五四」的獨特性和多面性，但是「五四」始終是在地知識社群思考國家民族何去何從的精神燈塔。武漢大學裴亮在其報告〈「五四」在南國：私立嶺南大學與廣州現代文學的發生〉中也指出近年來不管是對五四運動的興起原因的研究，還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播研究，在視角與方法上呈現出一種「地方化」的趨勢，從對北京、上海「二都物語」的中心敘述、轉向對「五四」與邊緣地方城市之關聯性的注目。五四新文化的地域性發展過程中，地方與中央之間文學往來是中心城市對地方的單向度「引導」，還是一種雙向的「互動」，作者圍繞這一思路，先後考察了五四新文學的地域性與嶺南現代文學的發生問題、在地輿論的蓄勢，和一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為代表的地方校園文學團體的發展情形。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青年博士生呂欣從嶺南學術思想的視角、哲學方法的關注點切入，提出從「嶺南」的地域性自我發展出發，反思與再發現如嶺南第一大儒陳白沙（1428-1500）等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大家之思想，可以找尋到長時段視野中嶺南文化自身具備「本土意識」，這種「地域文化」視角可以辯證導向「地方化」趨勢的方法，有著通往「國」、「東亞」、「世界」的思想特質，也可找到具備普遍性的意義。

## 二、東亞視域中的「五四」

東京大學林少陽的〈戰後日本史學界的「近世」論及「明治維新」周年慶的思想史考察——重審「五·四」中心史觀的兩個角度〉，肯定岸本美緒「近世」論之所以不失為穩健、謹慎的一說，這體現在岸本將中國史的「現代」的起點設定在16世紀，並依據傅禮初（Joseph Fletcher，1934-1984）的「現代」觀點，認為這是全球複數的地方出現的「早期現代性」（early modernities），以避免東西二元的框架。因為任何二元都容易令其中「一元」成為「中心」，這是要儘量避免的中國（東亞）中心史觀。岸本將中國史「現代」的起點設

定在16世紀，是基於全球複數的地方出現了「現代」的判斷，就匯出一個有所區別於內藤湖南（1866-1934）將宋代視為中國現代性起源的「唐宋變革」論。報告旨在於質疑「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關於中國史的相關敘述和想像。另外，報告人重視以日本的視點，詳細考察了日本對「100周年明治維新」和「150周年明治維新」的不同反應，指出明治維新與直至1945年之前不間斷的戰爭之間有密切關聯，既是日本現代化運動取得一定成功後開始模仿西方帝國主義而走向帝國主義的一場運動，同時是日本知識菁英和政治菁英的集體選擇。受到現代主義意識形態影響，漢語圈對明治維新的評價很高。值得注意的是，現代主義意識形態與「明治中心」、「五四中心」影響分不開。長時段看歷史，打破中國（東亞）中心的史觀，才能理解所謂現代化和追求明治維新的內在統一性。如此才能理解「五·四」與其後中國命運的內在關聯性。日本學習院大學暨四川大學的王瑞來評論道，林論問題意識極強，蘊涵意義深刻，同時提出「五·四」在中國史及思想史上的定位等問題，值得延伸討論。

北京郵電大學宋聲泉的〈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的交織——波多野乾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即時觀察〉旨在從經歷者和當時人的敘述中去把握五四新文化運動更多的歷史面向。作者專門研究了曾有過長期中國經歷的日本專家型媒體人波多野乾一（1890-1963）的新文化運動論述，以此透視新文化運動在當時日本的接受情形。波多野乾一的敘述不屬於特定學科和特定史學觀指引下的歷史研究，使得他的研究彌足珍貴，其中不乏閃亮的認識，如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定性為「在促進混合政治及思想為一體之所謂新人政客者之自覺，而實行政黨中心之革新思想的運動」，不免讓人耳目一新。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陳繼東的〈鄰人的視線：日本大正時期中國研究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應〉通過梳理實時、實地置身或關注這場運動的三位日本漢學家的觀察，初步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日本的意義，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民族主義以及區域性文化認同的問題。其

中，諸橋轍次（1883-1982）的遊記《遊支雜筆》詳細介紹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事蹟，從中國內部與外部兩個層次，將新文化運動看作「一個理想過高而難以實現的運動」。青木正兒（1887-1964）在其創辦的雜誌《支那學》中多次介紹胡適和陳獨秀（1879-1942）等人發起的文學革命，積極支持和評價新文學運動。不同於胡適等人對待傳統的激烈批判態度，他秉持的同情理解和保存發揚的立場，這可能是中日兩國近代以來歷史境遇的不同所造成的。另一位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對待新文化運動呈現出冷峻的批評態度，對新文化運動的一些主張不以為然，表達出文化中心開始轉移到日本的立場，體現了一定的日本民族主義，更是一種重構東亞一體區域文化認同的主張。

南京大學孫江的報告〈到中國去：「五四事件」與日本知識界〉，以日本為視點，著眼於五四事件之後，東京大學的社會主義學生組織「新人會」的幾位左翼運動家，及其導師、基督徒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吉野作造（1878-1933）等人對五四運動的跨國反應和介入，通過他們在中國與知識界、學生領袖（主要是北大師生）、基督教青年會的聯繫和互動，揭示了訪華左翼活動家在考察中國「排日運動」的同時，趁機借道中國東北造訪被日軍占領之下的俄國符拉迪沃斯托克，並且因為在日本散發革命宣傳小冊子而有成員被捕的事實。最後，孫江教授指出，吉野作造力促的這場中日教授學生互訪計畫、亦即「中日提攜」訴求的波折、不順、變形顯示，吉野曾經教過的學生李大釗（1889-1927）、吉野當時的學生新人會成員與吉野之間，都已存在著政治思想上的隔閡。後者是要防止「過激思想」；前者是要傳播「過激思想」。此外，這點也反映了吉野本人的民本主義思想應對帝國主義有效但無力完全捨棄民族主義一面的困境。來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評議人譚仁岸指出：帝國主義和民族的對立似乎只存在於被侵略壓迫弱小民族之間，在帝國主義國家，例如20世紀日本，可以在很多歷史事件中看到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擴張訴求的合體。與其說這是吉

野民主主義的悖論，將其稱之為公平等原則貫徹不徹底可能更合適。

華東師範大學李永晶的〈五四運動在日本：另一種「當事者」的體驗、認知及其意義〉以「東亞世界史中的五四運動」這一問題意識入手，歷時地回顧了日本對五四的體驗和認知。作者先分析了五四運動發生的當時，日本作為「當事者」對五四的觀察、評論和分析。1950至1960年代，日本主流則流行起「五四禮讚論」。與此同時，竹內好（1908-1977）提出不可忽視五四運動與日本五七事件的關聯性，是二十一條給中國帶來了創傷，他的論述不同於當時的主流看法，將「支配民族與被支配民族」的命運關聯起來，具有世界意義。時至1970年代以後，左翼激進運動退出歷史舞臺，日本學術界開始反思戰後日本出現的「五四禮讚論」，轉向對五四運動實證主義的研究。作者最後認為提出帶著開放的態度，賦予日本關於中國的實證研究以新的意義，則是日本學者今後的課題。

同樣發生在1919年的朝鮮「三一運動」與中國的「五四運動」具有相似的歷史語境，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李恭忠的〈以鄰為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中的朝鮮「三一運動」〉考察了三一運動以後20、30年間這場運動在中國各界產生的反響和餘音，梳理了三一運動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語境下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階層各類表述。三一運動爆發初時，中文媒體側重從「公理」和「民族自決」等視角報導和觀察這場運動。隨著列寧式反帝革命理論的傳入，三一運動作為中國民族獨立與復興的一面鏡子，逐漸進入中國的民族革命話語中。尤其是北伐之後國民黨取得全國的政權，進而伴隨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劇，中國官方和文化藝術界越來越重視三一運動所體現的民族抗爭精神，政府層面甚至做出了幫扶朝鮮獨立的具體舉措。隨著馬克思主義在東亞的傳播與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在同樣高度重視民族解放和高度評價三一運動反抗精神的同時，也努力從三一運動中吸取經驗教訓，開闢了階級革命路徑和國際主義路線。作者認為作為「鄰家鏡像」的「三一運動」構成了中國民族主義話語資源庫中的要素之一，

為走向民族獨立和復興道路的中國人持續提供了正面的精神激勵和反面的借鑒。評論人慶應義塾大學段瑞聰提出諸如「三一運動」之當代意義的問題，把視角進一步引向中日韓歷史認識問題。

### 三、作為精神的「五四」

作為「精神」與「方法」的五四始終不曾消失，東京大學的小森陽一發表了主題演講〈中國的「五四」精神、知識分子傳統與現代日本的「九條會」精神〉，演講回顧了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至到日本「九條會」成立之間較長時段內東亞幾國的關係史，考察了在此長時段內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中，東亞知識分子間的彼此提攜與呼應。從朝鮮的角度而言，受到曾留日的孫中山（1866-1925）和章太炎等反抗強權的精神的鼓舞，留日的朝鮮學生於1919年發布「二八獨立宣言書」，繼而進而在朝鮮本土引發「三一運動」，從中國的角度而言，五四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借鏡了「三一運動」。從日本的角度而言，日本走向現代國家，與日本近代發達的教育密不可分，而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確立得益於中國的庚子賠款。在標榜「和平」的平成時代，日本無視自身遺留的戰爭問題，出現修憲動向，引發日本知識界成立了「九條會」，敦促日本政府承擔起歷史責任。小森陽一強調了「五·四」知識人傳統到日本「九條會」精神之間的共通性，認為這是知識人面對歷史與時代問題時所應持有的態度。

東京大學鈴木將久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五四」想像〉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譚仁岸的〈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與封建主義批判——兼論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關聯〉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潮對「五四」的承繼與發展。〈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五四」想像〉通過重點考察改革開放初期兩份青年刊物《這一代》和《青年論壇》，透視背後的大學生群體思想活動，討論當時大學生群體想像「五四」，進而推動「思想解放」的內在邏輯和實際

的開展過程。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大學生群體構建出豐富多彩的「五四」想像。以《青年論壇》總第9期刊載的甘陽文章〈說中西古今文化之爭〉<sup>2</sup>為代表的一種觀點，延續五四時代的現代文明觀，主張中國應該徹底擺脫傳統形態，走向現代。不同於「五四」對傳統強烈的批判態度，《青年論壇》總第12期刊載的郭齊勇〈關於近年來中國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評介〉<sup>3</sup>為代表的一種觀點，嘗試從傳統文化中發現啟蒙的根源，主張要重視17世紀興起的以顧炎武等人所主張的早期民主主義傳統和「格物究理」、「經世致用」的科學傳統。作者認為郭齊勇文開闢出另一種「五四」想像。

#### 四、「五四」人物及作品新論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董炳月作的〈幼者本位：從倫理到美學——魯迅思想與文學再認識〉提出：魯迅五四時期闡述的「幼者本位」是一種新的倫理觀，顛覆了傳統的長幼倫理關係，將長者對幼者的「恩」轉化為「愛」。魯迅的闡述是以其自然觀為基礎的，因此其「幼者本位」具有自然觀與倫理觀的二重性。魯迅「幼者本位」觀念的形成，直接受到了日本白樺派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的影響。而且，在魯迅這裡，「幼者本位」與進化論發生關聯，構成注重生命意志與生存權力的「幼者本位進化觀」。在魯迅的小說、散文、散文詩中，「幼者」作為一種角色，決定著相關作品的敘述方式、意義結構、美學面貌。來自北京大學的青年博士生孫大坤提出應指出以「幼者本位」批判「長者本位」的社會學原理究竟是什麼。而「幼者」與「弱者」概念的辨析，二者事實上暗含的是右翼思想與左翼思想的分歧。但在魯

---

<sup>2</sup> 甘陽：〈說中西古今文化之爭〉，《青年論壇》總第9期（1986年3月），頁69。

<sup>3</sup> 郭齊勇：〈關於近年來中國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評介〉，《青年論壇》總第12期（1986年9月），頁38-39。

迅這裡，二者被混淆，「幼者」這一語素的意義掩蓋了「弱者」的意義。並在魯迅 1919 年談論進化問題的微觀語境中提到，賣掉紹興祖屋，在北京置業，接來母親，並與兩房弟弟在八道灣落定。幼時父親的病故、祖父的牢獄之災而帶來的家道中落，至此被魯迅正式接手，終於穩妥地安置了一家人。此時發表「幼者本位」，聲張「進化」，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症候」。

復旦大學張業松所作的〈《狂人日記》百年祭〉提出：《狂人日記》的闡釋始終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是對「狂人」及其結局的理解，這個問題的形式化表現，即正文的「白話」與小序的「文言」二者在語言形態上觸目的並置和對立。這一形式化的呈現，實體化了時代的根本困境，也使得作品的意義表達變得曖昧：作品所提供的「新」與「舊」的情境框架，是「狂人」敗北的象徵，抑或有意味的錯置？文章從這一問題入手，以百年來中外《狂人日記》闡釋史為背景，細讀文本，以「狂人」名號係日記作者癒後自題、「候補」說法係來自「不可靠信源」的「被污染資訊」以及日記結尾「救救孩子……」句尾的省略號等長期被忽略的細節為突破口，重新定義了《狂人日記》的經典性。認為《狂人日記》的創出，來源於魯迅長久以來的關懷，有赴日留學時期明治知識環境的薰陶，更多是「從太炎遊」的思想和人格典範作用所致，總體上屬於晚清—民初中國（尤其是語言、文化上的）知識環境的產物，代表了這一時期「狂人」話語的主流形態。其開創性意義，在於樹立了現代自我的典型，是康德意義上的啟蒙的示範之書。就此而言，我們都是「狂人」的後裔。來自復旦大學的青年博士生吳天舟關注到「救救孩子」的理解問題：在「救救孩子」的前面，有著一個「救救大人」的前提，不完成這一步驟，就會有「娘老子」教出的惡孩子不斷地生出。而正文中的「狂人」所主力攻心的人，也正是這個「大哥」。如此看來，小說結尾的省略號如此低沉，或許可以視為這個既有鬥爭一面，又有幾分同路人色彩的「大哥」的「曖昧性」所導致？如果狂人不甘於只做一個孤獨的戰士，那

麼，要如何處理和這樣的「大哥」的關係，則必然需要成爲問題。在魯迅的視野裡，這個問題是始終存在的，而在五四及後五四的語境下，這個問題也從未退場，到了巴金（1904-2005）的《家》裡，覺新問題已然成爲小說最爲重要的議題之一。

北京魯迅博物館姜異新的報告〈魯迅仰仗的他山之石——「百來篇外國作品」尋繹〉，論文視點亦從日本出發，指出「百來篇外國文學作品」具體是指魯迅在留日時期通過他國語言閱讀的外國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周氏兄弟彼此在場的「再度東京」時期，其對俄國及其他東歐弱小民族國家文學的開墾初探。依據爲留日時期剪報、《域外小說集》及新刊預告，《域外小說集》之外的翻譯作品、獨逸語專修學校的教科書、魯迅自述及周作人的回憶文字等。明治東京是魯迅以異國語言閱讀和思考人類和萬有，自身母語在持存中歷經分娩陣痛的此在。與世界文學發生連結，是與人類一體的融入，消解的恰恰是魯迅文學的創生與起點思維，並不存在一個周樹人成長爲魯迅的線性上升的過程，或是魯迅思想迂回轉折的流脈，每一個當下均成就魯迅的文學自覺。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陳玲玲的〈碑學脈絡中的周作人——兼論他的同時代人〉從碑學系譜入手，指出晚清以來，西方人和日本人參與了中國的考古界與美術史界，使得中國知識人擴大了對美術範疇的理解。碑學的不斷興盛，改變了千年來帖學統天下的格局。把周作人放在清季以來的碑學脈絡中，梳理他的訪碑校碑工作和藏鑒金石拓片的日常生活，檢視他與朋儕間所共用的「精神貨幣」，以及碑學系譜中他與晚明文人的親和關係，並且以淪陷時期周作人與碑學系譜的關聯性探討他對待傳統的態度，來闡釋文類雜糅的周作人其思想與審美觀形成的源頭；同時指出以跨文化闡釋爲路徑來詮釋周作人及其同時代人的必要性。慶應義塾大學暨浙江工商大學張明傑評議，從碑學脈絡來考察周作人及其同時代人是一次有益嘗試，提供了新視角。另外，提醒論者注意碑學與帖學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二者隨做區分處理，

也有必要關注到二者間的相容性。

## 五、其他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趙京華的〈走出求法與傳道的留學怪圈——中國百年留學現象的反思〉回顧了百年中國海外留學史，認為中國處在「求法與傳道」的百年留學怪圈中，主張中國人不能重回「傳道」的老路上去，無論是西方人歐洲中心主義文明傳播論式的，還是東方人反向的申訴抗辯式的傳道，而應該走出「求法與傳道」的百年留學怪圈，建立文化自信基礎之上的現代高等教育體制，實現真正互通有無彼此平等的文化匯通下的思想學術交流。趙怡的〈《新法蘭西評論》(NRF)之中國新文學介紹——新文化運動與中法文化交流〉一文重點梳理了1930年前後法國《新法蘭西評論》刊物譯介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分析了當時兩國政府和教育界、思想界攜手展開的一系列文化教育合作事業的成果，也體現了新文化運動下中法文化交流的性格。作者認為這些交流的背後不僅有著中法兩國政府和教育界、思想界高層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暗含著中法文化相互尊重敬仰的傳統和現實態度，這與魯迅和創造社團體為代表的留日群體所呈現出的非此即彼的激進傾向完全不同。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青年博士生柏奕旻評議此文不限於留學史的「經驗」研究本身，而是試圖以此為起點，從中發掘百年留學「經驗」何以如此展開，以至呈現出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樣子，這一隱藏在留學史背後的「歷史觀」問題。這一過程中，反思留學史能夠提供一種特殊的視角，導引我們對於更多「現代史」敘述的宏觀、根本問題的反思。在評議中也引入了與自己研究關聯的難題：「文化」範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政治」變革的動力與方法。換句話從反面來說則是，如何能夠使「文化」成為一個真正擺脫非政治性的浪漫主義式概念。

北京聯合大學李自典的〈北洋政府時期北京城市治安防控管理述

論〉研究的時代限定在五四所處的北洋時期，研究對象是這一時期的北京城市治安防控管理，包括管理奇偶股的設置、法律的保障，以及管理模式和具體的運行機制等。北洋時期北京的治安防控，平時一般日常秩序維護靠員警，冬防及突發事件應對需要員警與軍隊聯合承擔，軍警聯合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管理特點，但軍警不分的問題，導致現代軍隊與警政的專業化發展受到限制。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青年博士生時嘉琪認為討論民眾（學生）運動和政府的應對行為應該是很審慎的。如果說一味認可和鼓動「學界風潮」，忽略了這其中可能包含的諸如燒砸曹府，毆打癱瘓的曹父和章宗祥一類的暴力因素，某種程度上講是持論的偏頗，那麼只因此就總結到「軍警要採取鎮壓」也並沒有多少說服力。

## 六、結語

在最後的圓桌討論會上，孫江概括了「五四」所創造的三個奇蹟。第一是運動爆發不久就有人命名為「五四運動」。第二個奇蹟是運動創造至少兩重的「五四」的元敘事，一是集體主義敘事，被定性為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二是個人主義的敘事，標榜自由、個人崇高和解放等理念。三是「五四」闡釋的霸權。這三種奇蹟皆有必要進行深刻省思。我們需要回到事件本身去看它本來的面目，進而考察這場運動隨後是如何被敘述的。其次，長時段的概念工具的使用，極有可能導致目的論的解釋。最後，「五四」闡釋的霸權同樣需要被質疑，「五四」應該是一種開放性的思考的開始，成為我們自我解放的工具，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五四」的目的。針對當今日本「五四」紀念活動基本缺失的現狀，林少陽認為因為中國不能再作為方法，所以「五四」在今日日本受到冷遇。紀念「五四」的最終目的是有一天可以不去紀念「五四」，因為彼時紀念的必要性已經不存在。

「五四」首先是青年的「五四」，熊遠報認為此次會議體現了「幼

者本位」的意識，為年輕學者提供了學習和質疑的平臺，這也是以林少陽、鈴木將久為代表的會議主辦方老師所用心而為的。整個研討會下來，參與評論的青年學者均是來自中國的身在東京大學等日本高校做訪問博士生的青年，他們各抒己見，以中國留學生的身分站在日本的校園發聲，在評論中展現了青年的風采，這恰恰是對「五四」精神的承繼與發揚。